

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

——道格拉斯·罗宾逊教授访谈录

潘琳琳

(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道格拉斯·罗宾逊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香港浸会大学首席教授,致力于发掘多学科性翻译理论研究。他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理论核心,辅以身心学、神经生理学、中国儒道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研究翻译问题。受访者结合1997年至2018年20余年间撰写的多部专著,以批判性的学术态度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阐述了符号学与翻译学研究的共振,内容主要涉及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关系、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的多元路径、符号学与翻译身心学的关联以及翻译符号学前景展望等方面。

关键词:皮尔士符号学;翻译学;翻译身心学;翻译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1)01-0089-05

Abstract: Douglas Robinson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translation theorist and Chair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 is dedicated to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One of his research directions is to study translation with Peircean semiotics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upplemented by the theories from somatics, neurophysiolog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etc. In this interview,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he critically detects the resonance of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by citing many of his scholarly monographs written from 1997 to 2017. The interview offers a detailed semiotic account of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Peircean semiotics and its relation to translation, the multiple routes of studying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its affinity to soma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Key words: Peircean semio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soma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emiotics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1.01.019

1. 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学

潘琳琳(以下简称“潘”):据我所知,您的研究兴趣之一是使用符号学方法研究翻译问题,您(Robinson 1997, 2015, 2016)的三部专著《成为译员:速成翻译教程》(*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 1997)、《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The Dao of Translation: An East-West Dialogue*, 2015)和《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Semiotranslating Peirce*, 2016)均将皮尔士符号学作为理论核心。您能阐释一下该领域的核心思想吗?皮尔士符号学和翻译学之间存在何种关联?皮尔士符号学是否有助于深入地理解翻译问题?以何种方式?

罗宾逊(以下简称“罗”):我所秉持的核心观点是:运用皮尔士符号学分析翻译问题应该始终使用动态的符号三元观,即关注一级符号(firstness)、二级符号(secondness)和三级符号(thirdness)三个范畴之间的互动与转换。皮尔士符号三元观是我推崇皮尔士理论的缘由之一,也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皮尔士在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建构了成千上万种符号三分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

入点和路径。在《成为译员:速成翻译教程》中,我主要使用的是皮尔士的本能—经验—习惯(instinct-experience-habit)三分法和溯因—归纳—演绎(abduction-induction-deduction)三分法。具体的做法是将溯因—归纳—演绎逻辑推理三分法融入到二级符号的经验之中。这种做法在皮尔士理论中很普遍,比如皮尔士先建立了符号—对象—解释项(sign-object-interpretant)三分法,再分别将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细分为三类,以此类推,持续不断地三分下去。关于对象的分类,我们可以有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象征符号(icon-index-symbol)三分法;关于解释项的分类,我们可以有情感—能量—逻辑(emotion-energy-logic)三分法等。因此,我的研究方法实际是遵循了皮尔士非常成熟的理论模式。

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允许我探索习惯和创造^①之间的张力。我们尝试将所做之事变成习惯,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做事的准确率。但习惯也会麻痹我们的思想,因此,习惯本身不应是终点,而应是通向创造力的通道。《成为译员:速成翻译教程》一书的出发点就是:习惯(三级符号)和创造(一级符号)。

同时,皮尔士理论还提醒我不要忘记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把一级符号瞬时的、未经分析的想法通过二级符号来检验和验证,这是皮尔士伟大的创造。他认为二级符号属于经验的领域,在这一范畴内,我们对新想法(一级符号)的期待可能会破灭,通过二级符号的检验而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偏离甚至背离原想法。因此,二级符号不可或缺,它联结了一级符号和三级符号。

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和《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这两本书中,我基本上是回应了两种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的案例。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中,我关注的焦点是格雷(Dinda L. Gorfée)如何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分析的过程中,我的研究视角转向了一些新领域,特别是重译方面。在《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中我重新应用了《成为译员:速成翻译教程》一书所构建的模型,并将皮尔士的概念“共同心灵”(commens²)融入其中,批判性地分析了格雷的学生哈达玛—黑诺伦(Ritva-Hartama-Heinonen)的研究中存在的偏颇之处。

皮尔士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原本并没有天然的联系。皮尔士本人也没有写过关于翻译的专著。他只是隐喻式地使用“翻译”这一词语:符指过程即是翻译。从本质而言,雅各布森将翻译分为语内、语际或者符际翻译仅是简单地扩展了皮尔士的观点,即从一级符号到二级符号再到三级符号的符指过程是一种翻译——每一次符号的转换都是一种翻译。在翻译界很多人并不了解皮尔士,也不喜欢他的理论,认为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中的翻译太过宽泛。但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翻译正是皮尔士符号学的魅力所在。通过翻译理解符指过程,并认识到在符指过程中从一个符号范畴转向下一个符号范畴时需要做出调整和变化,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翻译大有裨益。特洛普(Peeter Torop)就不太喜欢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他发展了雅各布森的理论,并对符号学的莫斯科学派、布拉格学派、塔尔图—莫斯科学派都做出了贡献,但是归根结底,他所借鉴的雅各布森理论也来源于皮尔士理论,特洛普所关注的所有的符号转换现象,仍然是在解构皮尔士关于翻译隐喻式的见解,即符指过程即是翻译。

我对将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更为感兴趣,特别是在《成为译员:速成翻译教程》一书中,我将皮尔士理论应用在了如何成为一名译者的过程,即如何进入这一职业领域的过程当中。我构建了“经验之轮”(The wheel of experience),将翻译过程设想成汽车的轮子:当它顺时针旋转时,翻译的过程是从一级符号经由二级符号达至三级符号的符指过程——从本能到经验,在经验范畴内翻译又经历了从溯因—归纳—演绎的逻辑推理,之后再完成从经验到习惯的转换。这是这本书的核心部分,但在最后一章,我指出当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比如原文本内容不连贯或者存在我们

不认识的词语时,“经验之轮”就需要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此时我们先开始演绎,并尝试将句法理解和身心理解应用其中,比如开始查阅词典等。然后我们再次进入经验范畴,从演绎经由归纳回到溯因。整个符指过程又开始重新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以溯因为起点,通过“经验之轮”的旋转来开始检验我们的猜测,直至最终达至三级符号的习惯。

潘: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一书中,您使用跨学科方法,通过四个案例研究使得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与语际翻译展开了有意义的互动。但是数字化信息时代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使符际翻译也被提升到翻译实践层面,翻译的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纸质符号文本,还涌现出图片、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的符号文本。那么,您在这本书里建构的翻译模型是否适用于符际翻译研究?

罗:当然适用。有关符际翻译我没有做太多研究,但如果我要做相关研究,应该不会使用雅各布森1959年的理论,而会借鉴特洛普的符号学理论。因为自从雅各布森提出翻译三分法之后,这一思想在过去的50年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延伸,正是受到了这50年思想的影响,特洛普的研究框架才更为完整。事实上,塔尔图符号学派已经将语内、语际、符际翻译发展成了一个普遍的模式,将翻译作为文化或文化作为翻译来研究。如果有人将他们的模型和我建构的模型整合在一起,就会发现我们的模型非常相似,因此,我的模型完全适用于分析符际翻译。

特洛普曾提到:心理学证明我们可以同时具有言语和视觉的概念。我刚刚写完了一本书叫做《混沌语言学:语言作为一种耗散系统》(*Chaos Linguistics: Language as a Dissipative System*³),这本书的理论就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左脑控制语言,右脑控制情感。我和特洛普曾有过交流,我建议可以将他的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翻译的模型想象为一张纸,然后将这张纸折叠起来,就会发现实际上文本外部因素会影响文本内部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大脑的外部塑造了大脑的内部。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们在那张纸的正面写上文本内翻译、文本间翻译和文本外翻译,这张纸的正面对应左脑,是由言语所控制的世界,包括文本内翻译、文本间翻译和文本外翻译,反面对应右脑,右脑控制情感,情感又受到视觉和听觉活动的影响。如果我们旋转这张纸,使它首尾相接,让它变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⁴),那么这张纸的正反面就会交叠在一起,情感融入到言语的认知,同时言语的认知也融入情感,这样我们就为符际翻译建构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符指过程模型,它受到整个大脑的控制。

2. 符号学与翻译学联姻研究的多元路径

潘:尽管符号学尚未成为研究翻译的主流范式,但

的确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路径也各有侧重。比如格雷在《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皮尔士的符号学》(*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1994)一书中,将皮尔士符号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为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Gorlée 1994);黑诺伦在借鉴皮尔士符号学中溯因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溯因翻译(abductive translation);特洛普对翻译的兴趣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紧密相关,倡导将翻译符号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您是如何评价这些不同路径的符号学与翻译学的联姻研究?

罗: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皮尔士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符号学家,他构建出如此复杂的理论,后世出现各种各样的应用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所长,有时也会产生分歧。我个人很赞赏特洛普的研究方法,它建基于抽象的形式主义,非常富有创造力和研究价值。但是我倾向于使用更具有动态性、更综合的研究模型。我曾经想过或许可以借鉴塔尔图学派的研究方法,并将它们转换为我所擅长或我所喜欢的研究方式,做一些搭建桥梁的工作。

最近我出版了《批判性翻译研究》(*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2017)一书,其中就借鉴了酒井直树(Sakai Naoki)和刘禾(Lydia H. Liu)的研究,将他们的研究称为批判性翻译研究,将我们的研究称为翻译研究(Robinson 2017),该书在批判性翻译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搭建起了桥梁,深入地挖掘了批判性翻译研究的内涵,使之能为翻译学者所用。现在我越来越想尝试做同样的事,即在将符号学方法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时,做一些搭桥铺路的工作。

《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中的任务之一是探讨格雷在其研究领域中没有提及的问题,并尝试给出我的答案,这就是一种架桥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符指过程。我认为格雷在一级符号范畴的研究十分成功,但她并未在二级符号范畴有所建树,即没有通过实践应用来检验她在一级符号范畴的溯因中所得出的观点,这就使她无法将一级符号范畴的观点升华为三级符号范畴的普遍理论或规律。我所做的研究正是从她的一级符号范畴出发,经由我自己建构的二级符号范畴,达至三级符号范畴,当然这一范畴的研究结果并不仅仅属于我,我只是在格雷的思想和其他研究之间架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对于黑诺伦理论的探讨就有些不同。通过深入地分析与论证,我认为她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多谬误。她在研究中将二级符号排除在她所构建的框架之外,而仍然将她的研究方法称为皮尔士方法,实际上并未抓住皮尔士符号学的要旨。她试图停留在一级符号层面,仅使用溯因,并在溯因中添加一点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的因素,认为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范畴的内容均属于传统翻译学者的研究范围,她不想再涉足,对于她来讲翻译就等同于创造。她将我在《成为译

员:速成翻译教程》一书中论及的译者的习惯称为“紧身衣”。而我认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译者的习惯可以成为“紧身衣”,这也是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如此有生命力的原因,因为它不仅探讨一级符号之本能如何转换为二级符号之经验,并最终转换为三级符号之习惯的过程,而且还关注作为“紧身衣”的三级符号之习惯如何逆向转换为崭新的一级符号之本能这一循环递归的过程。任何类型的习惯可能都会是崭新创造力的阻碍,一级符号之本能不得不打破习惯的束缚,并寻找继续发展、转换的可能性,从而展开新一轮的符指过程。

在我看来,黑诺伦坚持将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拒之门外,唯独关注一级符号的做法本质上不属于皮尔士的方法。她赋予一级符号之溯因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将它变成一种神秘的事物,认为译者根本就不用翻译,无需努力、思考,文本本身会自动翻译。格雷同样也有这种符号学神秘主义倾向,这一点我完全不能接受。《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的第二章从儒道哲学翻译观的角度讨论了黑诺伦的研究。在我看来,她所使用的是一种错误的儒道哲学翻译观。尽管她没有明确谈到儒道哲学思想,但她很有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中庸思想,认为译者不需要做任何事,译者让文本自己翻译就好了。她自诩为皮尔士浪漫主义者,但是德国浪漫主义借鉴了很多道家思想,并影响了美国的超验主义,爱默生(Ralph W. Emerson)和梭罗(Henry D. Thoreau)也都阅读过道家的经典文本,而皮尔士又受爱默生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皮尔士间接地受到了中国古典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对我而言,我不能接受黑诺伦所倡导的乌邦托式的翻译观,因为那是对老子思想神秘化、简单化的阐释。

黑诺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翻译过程方面,还存在于引用和转述皮尔士话语方面。她常使用皮尔士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即译者不需要有所行动,不用做任何事,只需信赖文本本身来做实际的翻译工作。但是她在引用皮尔士的论断时,脱离了语境。皮尔士曾说过:那些没有经过思考而做的事反而做得最好。她引用了这句话,但却没有给出相应的上下文。我找到了皮尔士这句话的出处,并仔细研究了它的语境。皮尔士当时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用了大概两页的篇幅来探讨直觉的本质:他的手表在船上被偷了,船长让所有船员一字排开站在甲板上。皮尔士来来回回打量这些船员,通过观察这些船员,他无法判断出谁是小偷,于是他就开始猜测,然后他就去了他凭直觉猜测出的船员的房间,并找到了手表。那时那刻,他说“那些没有经过思考而做的事反而做得最好”。黑诺伦引用了这句话,力图表达翻译的过程是自动进行的,译者仅凭猜测就可以了。但事实是,皮尔士的确首先凭直觉猜测了,但他后来还去了那个船员的房间,这属于二级符号行为:取证、检验、探索,而得出“那个船员就是小偷”的结论是三

级符号。对于皮尔士来说,随意的猜测作为一级符号也许是的,但是这种猜测需要通过二级符号的检验,才能得出三级符号的最终判断。黑诺伦把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都抛诸脑后,对于她来说,皮尔士所举的例子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胡乱猜想。

另一处引用的是皮尔士和他的学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的一个实验,他们的研究内容是如何分辨出对皮肤的两种不同级别的压力。这两种压力极为相似,很难通过理性判断去区分它们,所以他们就需要猜测。黑诺伦将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提取出来,以证明她的研究方法之合理性。但是,皮尔士通过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猜测有60%的准确率,他的观点是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任意的猜测,准确率大概为50%,而正确率如果能达到60%,那证明直觉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难道黑诺伦认为60%的准确率对于翻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吗?所以当我越深入地剖析她的研究,就越确信她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她对于翻译的理解以及对皮尔士观点的阐释都值得商榷。

潘:您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中批判了格雷对符号翻译的定义,您能简要总结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吗?在您看来她对皮尔士符号学存在哪些误读?

罗:我认为她的定义中存在的问题之一是并未明说究竟是谁主导了符指过程?或者说是什么力量驱动了符指过程?对于皮尔士而言,“进化之爱”(evolutionary love)驱动了符指过程。格雷似乎认为符指过程是受到某种神灵的力量驱动,但是她从未明确阐述过。她似乎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或许暗示了她认为天主教的上帝主导了符号翻译?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她是这么认为的吗?我写过一本书名为《谁翻译——论超越理性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2001),书中就探讨过这样一个观点,即翻译中存在神灵感召,比如有人认为英皇钦定版圣经的翻译就是由圣灵授意并控制的,是一部通灵之作(Robinson 2001)。那格雷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她并未明确表示。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存在某种力量主导符指过程,那么符指过程是如何通过译者展开的?如果译者不翻译,符号自己翻译,那么译者做什么呢?译者的中介作用体现在哪里?她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我在钻研皮尔士符号学时,探究了他是如何阐述上述两个问题的,发现他认为符指过程是由群体观念主导的,也就是由“共同心灵”主导。他从未说过符号自己就能翻译。他提及符号行为时,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隐喻式地指出这种行为似乎由符号本身所主导,以表明我们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符指过程,但是另外一半的时间,他则明确地指出符号自己不会翻译。我在《翻译之道:东西方对话》一书的第四章指出符指过程是由习惯主导,而习惯是受到“共同心灵”的影响而形成。

在我看来,格雷对于皮尔士符号学的阐释是一种狭窄并存在误读的阐释。她并未关注二级符号范畴的内容,所以当她在处理三级符号时,研究方法显得有些扁平化或者过于墨守成规,缺乏她在处理一级符号时的那种令人兴奋的革新性与创造性。格雷在《翻译中的维特根斯坦:探索符号特征》(Wittgenstein in Translation: Exploring Semiotic Signatures, 2012)一书中,用了两章作为二级符号来检验维特根斯坦的翻译(Gorlée 2012),但是整体的研究方法仍有失偏颇,我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中批判性地解读了这两章的内容,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做研究重要的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指责他人的观点,而是真正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并将它向前推进。

3. 符号学与翻译身心学

潘:若言及格雷符号翻译的要点,即可概括为翻译是符指过程。我认为《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一书的核心观点也可归纳为符号翻译是群体式符指过程(icosis)。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要旨吗?群体式符指过程具体是指什么?这一术语是您自己创造的吗?或者它还有其他的哲学渊源吗?

罗:“群体式符指过程”(icosis)是我自己创造的术语,但我主要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词语eikos(意为近似真理)的启发。亚里士多德曾谈论过人类一个奇怪的特征:比起真理来,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貌似正确的论断。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故事貌似合理却不真实,另一个故事真实却听起来不合理,让人们在这两个故事中做出选择,人们几乎总会相信那个貌似合理的故事,即使它是不真实的。他并没有解释其中的缘由,但我阐释出来的意思是:那些貌似合理的故事更易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经过了群体的过滤和净化,以符合社会的规范,也就是说这类故事受到了“共同心灵”的操控,而获得了群体的趋同。所以“群体式符指过程”这一概念是我对皮尔士“共同心灵”这一概念的延伸和发展。皮尔士只用了一个段落解释“共同心灵”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而对我而言,“群体式符指过程”与身心理论密切相关,它是身心理论的第四步。

第一步是身心标识(somatic marker)。我们的身体会将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信息发送给大脑,待到我们做决定之时,身体会从某些方面展现出这些倾向,以影响我们的决定:这是葡萄牙神经学家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身心标识假设(somatic-marker hypothesis)。第二步是身心模仿(somatic mimesis)。当我和你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相互映射,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在模仿你的身体状态,而你的身体也在模仿我的身体状态。我的身心标识,也就是我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可以通过这种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系统传递给你。

第三步是身心交换(somatic exchange)。身心模仿或者身心映射在群体中迅速循环、传播并发生交换,因此,我们在群体中可以感受到其他人所感受的内容。第四步是群体式符指过程(icosis)。我们在群体中不仅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我们还一起创造了一个统一的、规范的群体观点或态度。经过身心标识、身心模仿、身心互换和群体式符指过程这四个步骤,信仰、规范、价值观等就被群体创造出来,并稳定下来。

这就是我对皮尔士的概念“共同心灵”的扩展。

潘:您的群体式情感—意动—认知符指过程和皮尔士的三分法(溯因—归纳—演绎,本能—经验—习惯和情绪—能量—逻辑解释项)有何联系?

罗:我的情感—意动—认知符指过程主要和皮尔士的情绪—能量—逻辑解释项直接相关。情绪解释项是一级符号,与情感相对应;能量解释项是二级符号,与意动相对应;逻辑解释项是三级符号,与认知相对应。皮尔士认为指号过程总是不完整的,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或者受到自身感受的驱动去做出某种行为,却并没有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被我称为认知顶点的逻辑解释项,并不一定总能发生。情感转变为意动基本上就属于达玛西奥的身心标识假说,即身心反应或身心标识的感受先引导我们做出某种决定,再产生某种行为。无论是我的情感—意动—认知的转换过程,达玛西奥的身心标识—决定—行为,还是皮尔士的情绪—能量—逻辑解释项,都是一个三元过程。

4. 翻译符号学前景展望

潘:在中国,一些学者尝试将翻译符号学建立为一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符号学分支学科,专门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他们从丰富符号学类型与研究范围以及对符号学和翻译学的启示等角度,指出了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前景。您如何看待这一初创理论?

罗:当然可以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什么不呢?我认为学界有些人很介意学科的界限问题,认为翻译学与符号学的分界应该泾渭分明。如果某个符号学家借用翻译学的东西,或者某个翻译学家借用符号学的理论,他们就会觉得很糟糕。我非常痛恨这种地盘争夺战。对我来说,人生是复杂的,而我们研究人类的生活,就应该尽可能地使用我们能找到的任何工具,从其他学科借鉴的东西越多越好。其实,我更关注跨学科性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学科。如果有学者想将具有跨学科属性的翻译符号学建立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我认为很好,它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符号学与翻译学的研究。

潘:翻译学从各种各样跨学科的方法中获益匪浅,翻译研究经历过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等,在未来,翻译学会迎来符号学转向吗?如果我们想在翻译符号学

领域有所突破,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是什么?

罗:我在《皮尔士思想之符号翻译解读》一书的序言部分,讨论了翻译研究的符号学转向的相关问题,认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符号学转向。如果曾经有过符号学转向的话,我可能会转身离开,因为我在学术上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建构的模型是将皮尔士符号学与翻译有机地联系起来,适用于阐释翻译过程和与翻译市场相关的问题,相对而言,特洛普的研究更具普适性和综合性,如果将来会出现符号学转向,我想应该由塔尔图学派引领。

关于翻译符号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你可以去采访一下特洛普,他会给你列出一张有关研究方向的清单供你参考。目前有这么多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翻译中不同的问题,我感到很欣喜,因为这创造了这一领域的复杂性,也增强了翻译研究的生命力。

* 此文由作者与罗宾逊教授英文访谈稿翻译而成,感谢罗宾逊教授对英文访谈稿的细致审校。

注释:

- ① 这里的创造指在一级符号范畴中通过溯因对未经解释的现象提出假说,这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创新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新想法。
- ② 皮尔士“共同心灵”指文化或群体的力量会影响或塑造符指过程。
- ③ 罗宾逊近期完成此书的撰写,尚待发表。
- ④ 莫比乌斯带是一种拓扑学结构,它只有一个面(表面)和一个边界。它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在1858年独立发现的。这个结构可以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

参考文献

- [1] Gorl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M]. Berlin and Boston: Amsterdam-Atlanta: GA, 1994.
- [2] Gorlée, D. L. *Wittgenstein in Translation: Exploring Semiotic Signatures* [M].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2012.
- [3] Robinson, D. *Becoming a Translator: An Accelerated Cours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4] Robinson, D. *Who Translates? 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M]. Albany: SUNY Press, 2001.
- [5] Robinson, D. *The Dao of Translation: An East-West Dialogue* [M]. London and Singapore: Routledge, 2015.
- [6] Robinson, D. *Semiotranslating Peirce* [M]. Tartu, Estonia: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16.
- [7] Robinson, D. *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and Singapore: Routledge, 201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日马克思主义翻译传播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8YJA740011)和北京市教委专项哲学社科创新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翻译传播研究团队”(项目编号:2021753062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潘琳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薛旭辉